

启 事

我会征集文史资料工作开展以来，承征集员、通讯员和各界人士大力支持，现已刊出九期，深受爱好者欢迎。今后，文史组还将继续扩大稿源，广泛征集双柏县历史上各方面的史料。在新的一年里，敬请继续撰稿、组稿，并对文史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史料贵在真实，必须认真严肃对待，为此，凡来稿中由于事隔较长，记忆不清等原因，对内容、情节、时间、地点有出入部份，经查证后，曾作修改，对文词欠妥之处，也作过适当修改，敬希赐稿同志见谅！

祝同志们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政协文史资料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 双 柏 县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
* *****

第 九 期

政协双柏县文史资料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目 录

1、平叛菁口匪乱的回忆·····王文俊

2、1948年双柏中学罢课始末·····苏毓全

3、回忆英勇献身的征粮干部朱泽典、张纯仕同志·····

李毓林 口述

法增和 记录整理

4、双柏县的西医西药引入·····苏丕光

## 平叛菁口匪乱的回忆

王文俊

一九五〇年四月，全县开展征收一九四九年公粮工作，组织了征粮工作队，分赴各乡镇，当时我等被分配在菁口，一天，当我们走到小平地时，看见妥甸龙打坝村的兵痞（外号小号兵，是旧常备队的号兵）张××

坐在路旁，窥视着我们，当我们刚想与他问话时，他一转身就走进菁口村去了，我向尹伟仁等探问了几句这个人的姓名住户，休息了一会儿后走进菁口村。谁知我们遇到的“小号兵”是从新街派到妥甸传信发动暴乱的，不料在菁口遇到我们，就打算把我和谷青一网打尽，于是就此在菁口组织暴乱。

我们来到村子的大庙里找到谷青，坐在屋檐台阶上边喝水边谈征粮情况。过了一会，忽然发觉院子里来了许多人，回头一看，尹伟仁他们一同来的四人已不见了，这时又有十多个人手拿扁担走进院来，我立即站起来问他们：“没通知开会，你们来干什么？”一个四川口音的人（名叫唐大昌）手拿栗树扁担边走边答复说：“我们是来捆杨世昌（本保大地主）游村的。”边说边眨着狡猾的眼睛向我和谷青走来。在离我两步的地方，他突然举起扁担向我头上打来，并喊道：“抓活的，不要放走工作队！”说时迟，那时快，我把头一偏，扁担擦头皮而下，我顾不得再想，两步跳到火塘边，拿起一根栗柴回身向唐匪打来的第二扁担迎

去，两棒相遇，他的扁担脱手飞开，我趁势举棒纵步跳下台阶，冲向院心，直奔大门，守在大门口的两个匪徒见我来势猛，吓得呆在门口，我刚冲出大门，他们才呼喊着重来追赶。我尽全力忍着头痛冲出村子，向下猛跑直奔菁底，终于借树林掩护摆脱了追赶，而谷青却被他们堵在院内抓住了。这时，我跑到一片树林里，只觉得头昏眼花，我坐下来喘了口气，又迅速向妥甸方向跑来。

约中午时分，我跑到妥甸街大庙门口（老国营食堂旧址），看见几个公安队员正在喂马整鞍，其中有一个本地入伍的同志，名叫小双全，他看到我的模样，问我从哪里来，出了什么事？并告诉我说胡书记正在里面，准备要去格拉街。我一听，也来不及答话，急忙进庙上楼，只见胡廷祥同志正坐在楼台上考虑着什么，见我进去，走来打招呼，我一时心情激动，见了亲人便心情宽松下来，顿觉浑身无力，几乎瘫倒，胡书记赶忙扶住我，并让在场的公安队员拿茶水喂我过了一会，我清醒过来，看见胡书记，刘县委（刘建国）、刘清元、杨动等同志围在我跟前，就急忙把情况报告他们，但那时我不知道“暴乱”这个词，第一句话就说“他们打我们了。”胡书记让我慢慢说，我喝了几口水后，把所发生的事详细报告给胡书记。

胡书记听完我的汇报后分析说：“看来土匪已经暴乱了，我们刚才也接到报告，你这一来，更证明这情况是准确的，你先去休息一下。”他就招呼刘县委他们进屋研究去了。

不到半小时，胡书记就将所有在妥甸的公安队和工作队集中起来，作了部署：“现在菁口已发生土匪暴乱，我们要立即前往菁口进剿土匪，

援救被抓的谷青同志”。然后发给我一支长枪，要我坚持一下，带路前往新口。临行又强调说，此去要速战速决，返回妥甸以控制全局。

小分队一路紧赶，于下午四时左右到达普口村后山，先抢占制高点并分兵包围，向村子逼近，这时，只见大庙内火烟升腾，估计土匪可能正聚集在庙内，于是就攻进大庙，可是庙内只有四个人，经审问后得知：在我逃出重围后，谷青同志就被“小号兵”等匪徒抓住，五花大绑，百般侮辱后戴上尖尖帽押着游村，然后唐大昌等安排了四个人到保公所里去煮饭，其他人赶快回家收拾准备，然后到保公所来吃饭，饭后把谷青押送到雨龙，与别处的工作队员一齐杀害。不料我们及时赶到攻下大庙，土匪一听枪响急忙逃跑了，我们只俘虏了庙内的几个，接着到村中搜索，在村旁的一棵树上找到被绑着的谷青同志，已被折磨得神智不清了。我们把他解下来扶回大庙（保公所），胡书记安排大家吃了饭，要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然后押着四个俘虏返回妥甸。

回到妥甸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三月十八），胡书记他们要到麦地新去，我因劳累过度，胡书记将我安排到我的亲戚家休息。我在妥甸住了一天，由蒋吉新把我领到瓦玻利村，再请李××由小路送回县城。

## 1948年双柏中学罢课始末

双柏中学始建于云龙（老双柏县城）。1947第一次迁到妥甸，（后又搬回云龙，最后第二次又搬妥甸）当年秋季在妥甸招收初中第五班，

（当时只有初中）在校学生有初中第三、四、五三个班，共120多人。

双柏中学迁妥甸时，未建校舍，学生宿舍住在小团山，（今粮食局所在小山头）土主庙，成隍庙内，教室和教师宿舍第一学期在官全庙内（老国营食堂），第二学期搬到观音寺，操场在教场坝，各方面的条件较差而简陋，尤其是雨季更为艰苦，房子漏雨无法睡，晚上自习要到观音寺教室内，泥滑路烂，常有学生跌成泥人。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全体师生有苦都无处诉，因县级其他单位尚在云龙，还未迁来妥甸，当时双柏中学的校长由县长陈键兼任，还在云龙，学校的一切事务由教务主任杨材芳负责，而杨材芳长期不在学校，师生的艰苦处境，他根本不问不问，学校经费杨任所欲为，贪污挥霍，教师应得的工资不能按时按数拿到，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要说校舍的修建了。在这种情况下，正碰上即将召开县参议会，倪家宁、杨动、陈继斌、苏晓亚等几位教师，提醒学生，由每班选举两个学生代表组成请愿团，到县参议会请愿，要求增加学校经费，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并要求撤换不称职的教务主任。各班很快选出了代表。三班：李永吉（妥甸河尾人）、杨珠（野牛人），四班：苏立厚（大庄人）、郭汝植（法裱人），五班：苏毓全（大庄人）、杨晋本（法裱人）等六人组成学生请愿团，肩负全体师生的委托，到云龙县参议会请愿。

学生代表在县参议会出现，是他们未曾料到的事，首先遭到县参议长王凤林的无理指责，不让在县参议会食宿，更不准参加会议。学生代表当即提出反驳：“县参议会是国家的地方，不是私人的地盘，县参议员有资格住，学生代表同样有资格住。至于准不准参加会议的问题，是学生代表的自由，无出席代表的资格，列席代表的资格总应该是有的”。县参议长听了我们学生代表的反驳后，意识到用硬的是无法拒绝的，改用软的办法，想把我们学生代表骗回学校。答应让我们住下，并派人招待我们的伙食，晚饭后派人来和我们学生代表协商，只要我们回学校，他们会把我们所提要求，列入会议议题讨论解决的。我们已看穿他们的话纯属骗局，坚持一定要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不达目的我们不回学校。最后议长只好不知可否的答复，等与县长商量以后再说。

第二天早上，我们六个学生代表到县政府找到县长陈鏊，以校长称呼，向他汇报了来意和议长的态度后，他仍然是动员我们回校，并说作为学生应很好的读书，不要参与政治。我们说：“我们是来请愿不是参与政治，是要求县上增加学校经费，同时不要使已经决定拨给学校的经费，被经办人贪污，不用在改善学校条件方面，使师生夜间睡觉都受雨淋，起码的安心读书的条件都没有，正因为是要很好的读书，我们才来请愿，请校长对全体学生的要求给予支持，我们不能辜负全体同学的重托，不让参加会议，我们不回校”。在我们一再坚持下，他身为兼任校长，只好答应让我们列席会议，推举一代表在会上发言。经过坚持斗争的结果，我们取得了第一步胜利。

得到了明确的答复，我们准备了在会上的发言稿，请苏晓亚老师（

他是麦地新乡的参议员)帮助修改,他告诉我们,学校的经费除被杨材芳贪污外他还私自将80石谷子给本不应该再在双中拿双重工资的兼挂名校长的陈铸。因此早就应该修缮的校舍,无钱修理,使师生受雨淋,教师拿不到应得工资使生活受影响等情况,更坚定了我们坚持斗争的决心。发言稿的内容:首先谈了我们双中的教室,宿舍住的全部是破庙,上课和睡觉时都受风吹雨淋,无钱修理,教师不安心教学,学生不安心读书等情况后,提出四点要求:

1、由县参议会责成杨材芳向双中全体师生公布双中经费的收支账目;

2、要求县政府增拨经费,修建双中的教室和宿舍,使学生有起码的学习环境;

3、由县参议会指定专人监督双中的经费开支,保证如数用在办学上,并监督教务外立即补发教师工资,和保证今后按月按数发给教师工资; 4、教务主任杨材芳经手学校经费的账目不清,而且长期不到学校理事,已经失职,要求撤换。

按会议安排的议程,我们推选四班代表苏立厚在会上发言,多数参议员对我们的处境和要求表示同情和支持,陈铸和杨材芳的所作所为他们也是知道的,但因当时的社会背景,他们在发言中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接触到实质性的问题,因为问题涉及到县长陈铸,所提要求在会上没有付诸表决。由议长宣布:双中经费除已经决定拨给的外,因县财政困难不再拨给;学校的修缮问题责成杨材芳解决;是否撤换教务主任由县政府决定,就这样不了了之而告终。事实上我们学生代表去以前也没

有抱圆满解决希望，只想通过请愿，将学校的处境给县上当权者们知道，同时给陈铸、杨材芳等人受点震动，以后不要任所欲为，使学校会办得好一些。

会议闭幕后，我们六个学生代表讨论，既然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回校后把矛头指向杨材芳，进行罢课，使县上当权者们和社会上受到点大的震动，促使县上重视解决双中的问题。我们回校在全体师生会上报告县参议会斗争经过和会议结果后，提出罢课的意见，全体学生一致同意。于是，自1948年4月中旬（详细日期记不清）开终罢课，其口号是：抗议杨材芳贪污学校经费和将学校经费挪作它用，使本来应该修理的教室、宿舍得不到修理，影响学生学习，要求撤换杨材芳教务主任职务，尽快修理校舍，县上如不解决，就不复课。不出所料，罢课一个星期后，县上派人来解决，动手修理教室和宿舍，补发了教师的工资，宣布撤掉杨材芳教务主任职务，由苏晓亚老师担任。历时两个星期的罢课斗争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全体师生复课转入正常学习。

（48年双柏中学罢课的始末，由于事隔四十多年，又未保存任何记录，仅凭记忆，难免有遗忘之处，请与现在还健在的当时的教师和同学，进行多方面的了解后，作修改和补充。）

苏毓全

## 回忆英勇献身的征粮干部朱泽典、张纯仕同志

李毓林 口述

法增和 记录整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和平解放，地下党领导的边纵游击队和进军西南的解放大军随即接管了国民党双柏政权，开展了新政权的各项工作。

一九五〇年三月，我随征粮干部朱泽典、张纯仕二同志，到大麦地开展征收累进粮工作。我是土生土长的大麦地人，懂彝话、汉语，地方情况熟悉，就被聘请当翻译。朱、张两位同志懂政策，有群众工作经验，我们的共同配合，对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完成县委交给的任务，决心大、信心十分坚定。我们到大麦地后，经半个多月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大麦地、底土的累进粮征收工作。

一九五〇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我和朱泽典、张纯仕同志，从底土保公所出发，前往光明保公所继续开展征粮工作。途中，我们到芭蕉菁村休息时，碰上了村里的方师尧，他用彝话对我说：新平、崂山一带，土匪已经暴动；新街、说全的征粮干部被土匪抓了。在这之前，我们什么情况都一无所知，我听了这个消息后，意识到是个问题，便立即向朱、张两位同志作了汇报。朱泽典同志沉思了一下而后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们是不怕死才来革命的”！“我们不能逃跑，继续到光明保公所辖区去做群众的工作，要坚决完成任务”！同时，还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在芭蕉菁休息片刻后，我们沿着山

路到了光明保公所。

农历三月十五日（到光明的第二天），我们三人走村串寨，挨家挨户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对各村的“大户”，讲明政策，进行了教育工作。

我们跑了一整天，感到有些疲劳，晚上九点多钟，准备上床休息，突然光明村的方××来找我，说：底土送来一封信，叫我出去拿。当我走出住处大门，一伙匪徒趁机冲进朱泽典同志住处，抢了他的枪，把他死死压倒在地上，再用绳子捆起来；张纯仕同志看到土匪来势很猛，拿起刚解开的衣服，向大门冲去，不料被守在大门口的匪徒通了一刀，张同志也被抓住了。

我被叫出大门后，拿着棍棒、刀枪的四五个土匪向我拥来，脚踢手打，刀、枪一齐上，被打得无法动弹，昏倒在地，土匪又用绳子把我的两个大拇指绑在一起，由一个土匪看守着我，过了一会，我慢慢地苏醒过来，只觉全身疼痛难忍，屋里传出一阵阵打骂声，连看守我的土匪都进屋呐喊助威去了，我看身边无人，便从大门口自己滚到路边的蚕豆地里，挣脱了被捆着的两个拇指，一步一步地爬到光明村背后的山上躲起来，在山上的整个夜晚，只看到土匪点着火把，来来往往，到处寻找抓我这个“漏网的”，从此，两位征粮干部，我们三人再也无法见面了。我是土匪杀害大麦地征粮干部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的人告诉我，三月十五日晚上，朱泽典、张纯仕同志被土匪捆绑后，搜去了他们身上的东西，用棍棒敲打，连夜审问；三月十六日又把他们二人押到底土吊打，土匪们使尽了一切毒辣手段，

两同志被吊在树上，打得遍体鳞伤，但是朱泽典同志却不断地痛骂这些匪徒：“我们的队伍会回来的，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人民会为我们报仇，你们总有一天会灭亡”！匪徒打的厉害，朱同志骂的越凶，他视死如归更加坚强。土匪又把朱泽典同志的衣服脱掉，两手两脚各绑在大树上，让其在烈日下暴晒。朱同志被晒得血汗淋漓，痛苦十分，想喝口水土匪都不让喝，还骂朱同志说：“你们共产党要共妻，你们不是人，是吃猪屎长大的！喂他猪屎”！朱同志挣扎着抬起头来反驳道：“你们是对共产党的污蔑！我们共产党为穷苦人民翻身求解放，做事光明磊落！”土匪又是一阵毒打，不让继续说下去。土匪们随即拿来猪屎，塞进朱泽典同志的嘴里。就这样，不给吃不给喝，在烈日下吊打、暴晒两天两夜，又用“磨担揪”给他受刑。年仅32岁的朱泽典同志，为革命在土匪的酷刑折磨下光荣地牺牲了。张纯仕同志被打得遍体伤痕后，土匪把他拉到新街，和其他征粮干部一起被杀害了。

我今年85岁，事隔38年了，烈士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临危不惧，英勇献身的精神，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大菱地人民永远忘不了你们！

丹心献给党  
热血洒彝山  
颂歌传千古  
芳名万代扬

## 双柏县的西医西药引入

双柏县是个多民族山区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本地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瘟疫流行，民众生活贫困。长期以来靠中医中药治病，信鬼神、巫医者甚多。我省西医西药传入近一百年历史，我县西医西药引入为时甚晚。

一九三〇年大庄村苏毓琦，自幼在大庄公学读书，高小文化程度，十六岁在云南空军医院学习西医西药并当任护士，他从昆明买回盘尼西林（青霉素针）、阿的平片、奎宁类、磺胺类、解热止痛类、癫茄类西药，在大庄村开药铺，并在沙甸街、格拉街、法裱街巡迴行医。

当时民众第一次看见不拿脉的西医诊断疾病方法很不理解，特别是首次看见黄色的“阿的平”片时，好奇地称为“洋雀蛋”。由于不懂西医西药治疗疾病的原理和方法，患者一怕打针时疼痛受不了，二怕只吃一小点药片治不好病。加之当时药价昂贵病民支付不起，如1瓶20万单位的青霉素药价一石谷子（250市斤），1片阿的平片药价合当时国币六千元（折合人民币6角）。

在民众卫生医药知识有限的年代里，对西医西药这一新生事物不易接受。苏毓琦自知仅靠西医西药治病难被患者接受而边行医边拜本村名医苏用周、苏全为师，学习传统医学，用中西医两法行医治病，直致建国初期。

根据调查资料所得，一九三〇年起为双柏县西医西药引进，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之始。

苏丕光